

收稿日期:2025-05-20

抗战时期《淮流》的青年宣传动员

胡成龙,陈雨璇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卢沟桥事变后,豫皖苏根据地作为联结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枢纽,迫切需要整合抗战力量,共同御敌。但彼时根据地的青年在战火中面临教育中断、思想迷茫与行动无措的多重困境。在此背景下,豫皖苏根据地党委领导创办刊物《淮流》,教育、宣传动员青年。通过梳理《淮流》这份由豫皖苏根据地党委领导的全新史料资源,可以总结出该刊物宣传动员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四大方法,即重构青年的抗战认知、培育青年的革命思想、情感动员青年抗战和坚定青年抗战必胜的信心。

关键词:《淮流》;豫皖苏根据地;皖北地区;宣传动员;青年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5-002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新闻通讯社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72—1949)”
(23&ZD216)。

作者简介:胡成龙(2000—),男,安徽芜湖人,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陈雨璇(1981—),女,安徽蚌埠人,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5.056

豫皖苏根据地是华北、华中联系要点之一,是苏北、山东的门户,同时有重镇铜山控鲁、豫、苏、皖之要,扼陇海、津浦之交汇^{[1]287},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区域之一。根据地迫切需要整合抗战力量,共同御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指出:“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2]豫皖苏根据地党委遵从中央的指示,积极创办报刊以动员民众抗战,守护战略要地。“在各年龄段中,青年是容易被革命唤醒和动员的。”^[3]因此,豫皖苏根据地党委领导下的《淮流》在阜阳地区创办,宣传动员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构建起“媒介-青年-抗战”的战时动员逻辑。

一、铅印小刊:《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的媒介溯源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李宗仁建立的青年军团改为政治工作队分赴豫南、皖北各县。皖北阜阳地区涡、蒙、亳三县的涡河以北地区是豫皖苏根据地的一部分,涡河以南地区各县属于国

统区^{[4]2}。1938年12月,第一政治工作队(以下简称“政一队”)来到阜阳,豫皖苏根据地党委派大批共产党员到政一队开展党的活动,领导宣传抗日救亡。“政一队”内共产党组织受双重领导,在组织上受鄂豫皖区党委领导,在工作上受豫皖苏区党委领导。1939年4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指示要“组织青年扩大参战运动,加入军队;各团体刊物出专号宣传华北抗战,对全国持久抗战的功绩,表扬青年各种英勇事迹的典型,号召青年继续参战”^[5]。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的指示下,“政一队”队长尹莘野,队内我党负责人贾世珍、朱鸿翔、马广智等人,以“政一队”的合法身份,于1939年4月在阜阳大观创办综合性半月刊《淮涛》。在皖北的宣传动员工作中,《淮涛》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社的《抗战艺术》《戏剧周刊》、怒潮社的《怒潮周刊》、阜阳青抗的《青年前锋》、游击纵队政治部的《前哨》、政治一中队的《青军》等刊物涌现,这些刊物不能夸张地说完全是受《淮涛》的影响而出刊的,但确实有很多的刊物是直接间接受《淮涛》的影响和刺激而出刊的”^[6]。《淮涛》发刊词着重强调:“要集中力量,向饥渴的青年和落后的群众突击。假使我们失掉了这部分力量,那就等于放弃了抗战工作,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大疏忽。希望本刊能够成为皖北青年朋友相互交换意见,砥砺工作的一个学习的园地;更进一步团结皖北所有的生动有力的青年,民族的前进分子。用青年的集体力量,来掀起长淮滔天的怒潮,流入抗战的激流中去!我们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惜牺牲去干,要把就是薄弱的一点力量也都用尽!”^[7]《淮涛》以鲜明的立场出现在皖北青年的视野之中,并发行至豫皖苏根据地,受到了豫皖苏根据地党委彭雪枫、吴芝圃同志的表扬^{[4]418}。1939年5月,豫皖苏根据地党委派周季方到阜阳组建皖北特委,与中共阜阳工委一起领导《淮涛》的宣传动员工作,在皖北特委、阜阳县委、“政一队”党的特别支部共同配合下,阜阳各县抗日救亡运动热烈展开。

1939年夏,除信阳队以外的各个政治队前往立煌集训,《淮涛》被迫停刊,原“政一队”与“政二队”合编为“政一队”。1939年8月底,新的“政一队”返回阜阳,随后信阳队在濮思澄率领下也来到阜阳参加“政一队”。濮思澄和庄坤、刘斗奎、张景华、朱鸿翔等人研究决定,创办铅印小刊《淮流》。《淮流》这一名称是在《淮涛》的基础之上更改而来的,大家认为原“政一队”曾出版《淮涛》,而现在是三个队合起来的,还要照顾到“政二队”“政三队”和在皖北的安徽省民族总动员委员会的几个工作团,于是把这个刊物定名《淮流》^{[4]425},既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像淮河之水,激流勇进,又表示放眼淮河流域广大青年。皖北特委书记周季方特地强调,“《淮流》是皖北特委的机关报”^{[4]425}。《淮流》从出版到停刊共7个月左右时间,正式发行的仅8期,是一个含有时事、政治、文艺和理论的综合性刊物,刊物发行的范围以皖北各县为主,西到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河南息县、潢川、固始。发行的对象除政治队外,还有皖北各县动委会、工作团、进步学校、各抗日团体、书店,也寄往抗日前线、新四军游击支队、豫皖苏区、淮北抗日根据地和其他单位,每期发行一两千册,最高时三千多册^{[4]412}。1940年3月,“政一队”奉豫皖苏区党委的指示撤出阜阳,《淮流》(包括《淮涛》)在发行第13期后停刊。《淮流》的创刊与出版不仅促进了皖北青年的觉醒,推动了皖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也带动了其他进步抗日团体和抗日刊物的出版。仅阜阳就有《淮上青年》《战地生活》《动员三日刊》等一批颇有影响的报刊,对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做出历史的贡献^{[4]429}。

二、宣传阵地:《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的媒介实践

党报党刊作为党创办或管理的媒介,其作用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而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系统性、深度化的内容生产,构建起信息传递、思想塑造、宣传动员的多维平台。抗日战争时期,《淮流》注重议题的纵深挖掘,尤为关注青年问题的解决以及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设有“青年问题漫谈”“文艺阵地”“前方通讯”等固定专栏,讨论分析青年议题并向青年传播。

该刊时常登载青年问题、国际现象研究、时事评论等内容,既涵盖全国抗战工作的重点,亦包含对青年的思想引导,推动了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的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唤醒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要,这“也是很久以前总理在遗嘱上指明的,是达到自由平等的最高革命方略”^[8]。《淮流》把青年作为关注与宣传动员的主要目标,不仅专设“青年问题漫谈”栏目讨论青年问题,还在其他专设板块刊发大量关于教育、宣传动员青年的文章,通过独特的话语实践对豫皖苏根据地及皖北地区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淮流》是一份综合性半月刊物,其版面设置虽受到容量限制的客观约束,但仍为青年单独开辟一个专栏。通过分析版块可知,“青年问题漫谈”和“文艺阵地”是核心版面,1939年分别刊发8篇和16篇,超其他版面。1940年“文艺阵地”仍保持14篇,成为持续性宣传阵地,“青年问题漫谈”虽减至2篇,但在其他板块的内容中仍保持对青年思想引导的重视。版面中青年问题漫谈栏目占据核心位置,主要刊发文章有《谈战时青年教育》《青年问题漫谈之一:在工作中学习》《关于青年的学习问题》《武装我们的头脑——青年问题漫谈之二》《战时青年恋爱问题》等,体现了对青年引导的优先。文艺阵地版块通过诗歌、木刻等多元形式,既节省文字篇幅,又能以视觉与文学结合的方式强化感染力。如诗歌《过阜阳》以简短的文字呈现了阜阳人民受战争迫害的画面,木刻版画《保卫壮丽的长淮》以简洁的线条传递保卫家园的精神,符合小报“短平快”的传播特点。

《淮流》登载的文章题材集中于“青年学习”“青年运动”“模范学习”“国际问题”等主题,“青年学习”(1939年33篇,1940年15篇)和“青年运动”(1939年23篇,1940年13篇)是报道的核心主题,占比高于“国际问题”和“模范学习”。这体现了《淮流》以知识传播与行动动员并重的策略,既强调青年自我提升,又号召其参与抗日实践。通过教育青年“在工作中学习”“开展自我批评”等,承担了战时“流动课堂”的功能。豫皖苏根据地及皖北军事形势严峻,亟须青年组织化参与军事斗争,“青年运动”题材的高频出现直接服务于抗战对青年力量的迫切需求。此外,“模范学习”题材通过树立“抗战英雄”,将教育目标具象化,激发青年的使命感。“国际问题”题材的存在则揭示了《淮流》试图通过构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认知框架,增强青年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这一题材虽占比低于青年学习与运动,但其作用不可替代,即通过提供外部视角,帮助青年超越局部困境,理解抗战的长期性与必然性,从而巩固思想防线。《淮流》的题材分布是青年实际需求与抗战动员目标动态平衡的结果:以“青年学习”解决知识短板,以“青年运动”驱动实践参与,以“国际问题”拓展战略视野,以“模范学习”坚定抗战使命,四者共同构建了“思想-行动-信念”的动员链条。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党刊对青年群体特征的精准把握,更凸显了在抗战语境下,抗战动员如何通过题材设计实现资源约束与动员效能的最大化。

(二)《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的内容呈现

《淮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我党建立的宣传阵地,其媒介实践不局限于信息传播的表层功能,更通过多维度的抗战宣传,完成青年群体从“个体”到“革命主体”的转化。报刊将抗战救亡的宏大命题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践行的日常逻辑,并通过苦难记忆与胜利叙事的交织共振,既唤醒青年对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又锚定其抗争意志的情感坐标。最终,这种认知、思想、情感与信心提升的复合动员,使青年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印证中,完成从“自发参与者”到“自觉战斗者”的身份蜕变。四个层面的协同作用,共同构筑起《淮流》作为战时宣传阵地的核心效能。

1. 认知建构:青年学习的抗战化引导

以“术”启智,传授青年正确的学习技巧。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习往往与青年工作互相绑

定,“在工作中学习,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到抗战的时代熔炉中去锻炼”^{[9]23-24}。在这些口号下,青年急于为抗战贡献力量,反而陷入了经验主义的误区,未能对实际工作产生多大效用。“想要在工作中学习,必须在工作中研究工作的规律性,紧紧把握住规律性,又必须在工作告一段落时,确实的加以检查,失败的地方必须讲究教训,成功的地方必须总结经验。在工作中学习的正确性是在理论与实践有机联系的基础上,把工作和学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0]17-18}《在工作中学习》向青年介绍了正确的学习方式,批判了当时存在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强调学习方法必须建立在把握革命规律性与科学性的基础之上。马广智同样强调青年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他认为:“现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起桥梁作用与先锋作用的是青年同志,而青年同志想要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就需要学习革命理论。要善于灵活地把这先进革命科学的理论运用到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中,应用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特点中。”^{[11]19-21}《淮流》将青年学习从空洞的口号转向切合实际的抗战化学习,使青年认识到“理论上的学习,要按部就班来,同时把一些实际问题和原理配合起来研究”^{[9]23-24},“从斗争中去学,学习中斗争”^{[11]19-21}。这是基于战时特殊环境下的实践理性,旨在解决青年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激情有余而能力不足”与无法掌握学习重点的问题。《淮流》在传授学习技巧的过程中,不仅塑造了青年的认知框架与实践模式,更通过认知的改变,推动了青年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以“学”聚能,呼吁青年与教师共同学习。抗战时期,豫皖苏根据地和皖北地区许多承担教育功能的学校被迫停办,“神圣的抗战已经进入到目前这样紧要的阶段,被称为民族灵魂的青年学生,许多的过着与社会无缘,与抗战无缘的生活”^{[12]20-22}。青年无法接触到抗战信息,内心逐渐麻木。青年教育亟须从日常教育转向战时教育,即“以人教人,以身作则,即是要学生做的事,教师先做和学生共做,要学生学的,教师首先提倡并从而共同学习,不合理的,不应该沾染的恶习,教师首先不做,首先痛绝”^{[12]20-22}。共同学习成为“病态”教育时光里的良药,只有“共事,共学,共同培养的方法,师生共同甘苦的生活,相互之间才能发生相亲相爱相知的关系,彼此之间绝不会存在隔阂,误会的阴影,彼此间,相互间人与人没有隔阂,事与事密切关系,才算是真的精神交通,情感的对流,才算是真正的人格的教育,战时的教育”^{[12]20-22}。《淮流》通过“师生共做共学”的话语建构,将传统教育中的“教学相长”理念嵌入抗战动员框架,以“战时教育”这一具有革命张力的表述,赋予了教师与学生在抗战时期的革命身份,推动青年从“脱离抗战的麻木状态”向“主动投身救亡的实践主体”转化,实现了教育场景与动员目标的深度耦合。

2. 思想塑造:青年思想的革命化转向

以“情”促战,宣传革命化恋爱的思想。抗战时期,“一切都是围绕着抗战,发生发展的,恋爱问题也不例外。因为人总是有感情的,青年人更富有感情,尤其是革命的青年,他们对于所爱的人和事往往充满热情。恋爱问题,到什么时候都是青年人不可避免的问题”^{[13]25-26}。《淮流》通过聚焦青年日常生活尤其是恋爱观问题,巧妙地将积极抗战与青年个体的生命经验相连接,实现了抗战思想的“微观化”建构。以“革命化恋爱观”议题将个人情感问题纳入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框架,既回应了青年群体的现实困惑,又完成了动员青年抗战的目标。“要想恋爱,先决条件要抗战,坚决的积极的抗战,在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不恋爱则已,要恋爱定要做个革命的恋爱者!”^{[13]25-26}“革命事业高于个人情感”的话语,强调了只有民族解放才能实现真正的恋爱自由。同时,《淮流》注重将恋爱观教育与如何抗战相结合,青年要“健全本身,求各方面飞速的进步,把自己的政治认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能力锻炼强了,人格道德可以做别人的模范,并可以推动别人和自己同时的进步时,那时候你不去找异性,异性也会来找你的,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好的爱人”^{[13]25-26}。这不仅塑造了青年的情感表达方式,更强化了“革

命青年”的身份认同。一句“做个革命的恋爱者”让彼时的青年们在困扰恋爱问题时,找准了奋斗的方向。以恋爱观为切入点的思想塑型策略,体现了战时青年动员的独特逻辑:既避免了空洞的政治说教,又通过日常生活议题实现了抗战动员的“自然化”渗透。

以“群”聚力,凝结组织化的青年力量。“青抗是青年统一的组织,抗战是全面全民的战争,所以青年运动也是全民性的,是容纳各方青年的统一的青年运动。”^{[14]26-27}《淮流》通过“以亲共情”的叙事策略,将青年抗日组织(青抗)建构为连接个体青年与抗战事业的情感纽带与行动载体。既强调了青抗作为“青年统一组织”的属性,又通过“信任”“共同成长”等情感化话语,建构起青年与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青年群体以抗日为目的汇聚在一起,向整个社会青年伸出了“亲近”的纽带,动员青年参与抗日。但是青年工作极具复杂性和困难性,动员青年和发展青抗组织要彻底做到与青年密切的联络,只有深入到广大的青年队伍中去,才能互相了解,互相信任;还要教育和影响落后的青年,向青年朋友伸出火热的手,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在学习上共同研讨,在工作上合力推进。同时,连接青年与青抗,让青年对青抗、对抗战充满希望与热情,就“要使青抗成为青年的学校,提高青年的认识,改善青年的生活,解决青年工作上的各种问题,彻底发挥青年的性能,激发青年的工作情绪,提高青年的学习热情”^{[14]26-27}。这种情感唤起并非简单的组织宣传,而是通过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抗日”等实践场景的描绘,将青抗打造为青年成长的重要平台。以青抗组织为情感动员的节点建立起动员机制,满足战时动员的需要。

3. 情感共鸣:抗战动员的情感化书写

以“难”唤情,指出学生运动的困境。回顾一·二九学生运动,“青年学生们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已经觉悟了。他们认识到了学生运动应当广泛地开展和严密地组织,并加强自我教育,用自己的、集体的力量来改变生活环境,抱定我先入地狱的精神,做别人的模范,发动和领导广大的民众为争取民族的生存而斗争”^{[15]24-25}。抗战时期,学生运动在民族危亡的激荡下,以更广泛的规模、更严密的组织和更直接的救亡行动,汇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之中。“两年半的抗战过程里,前线和后方以及偏僻的农村都洒遍了青年学生们为国家、民族而流的血汗。”^{[15]24-25}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学生运动仍然没有达到抗战的要求,反而有中落退潮之势,原因在于“广大的沦陷区域,教育没有恢复或健全,学生运动干部缺乏,一般青年的领导者们多少还存有不放心青年的传统心理,使领导变成了制止”^{[15]24-25}。学生运动的困境被转化为激发青年抗战热情的情感动员工具。《淮流》通过“血汗”“牺牲”等具象化语言客观呈现了抗战初期学生运动的严峻,唤起青年对学生运动的情感共鸣,又从教育体系不健全、干部匮乏、领导方式僵化等多个维度,揭示了当时学生运动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呈现并非为了制造悲观情绪,而是构成“文化创伤”的过程,通过“困境-责任”的转换,建构起青年学生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情感纽带,激发青年对抗战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

以“血”控诉,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日军攻打蒙城时,这座县城以“500 长矛、3 000 钢枪”^{[16]9-11}的简陋武装,与装备精良的敌军殊死搏斗。巷战昼夜不息,嘶吼与鲜血交织,最终 4 000 军民以血肉之躯筑成防线,与城池共存亡。日军的侵略暴行,不仅让青年读者感受到敌人的可恨,更激发了他们对抗战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十间房子没有顶,至今还是半边衰落半边空,焦黑的断壁上,强有力的质问,血红的标语:是谁炸了我们的房屋?”^{[17]20-21}《淮流》通过刊载短诗《过涡阳》,直观呈现了日军轰炸造成的涡阳县城惨状。残垣断壁上“血写的记忆”,不仅是控诉,更是铭刻于城市肌理的创伤印记。一日时间里,阜阳地区“树上架屋,家浮在水皮,饥寒迫人”^{[18]30-34}。即使如此,日军的暴行还不停止,“大约是五点半钟,(警报,警报)大街小巷都充满惊慌的喊叫声,更夹杂着杂乱的轰鸣声。接着,嗡嗡嗡……声音由远及近,(不好啦,不好啦,向咱们头顶上飞)通通

通(啊呀,这个掉咱们头上了)”^{[19]31-32}。蒙城县被敌军反复地轰炸,是侵略者飞机轰炸最早、次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县城之一^{[4]16}。面对如此深重的创伤,《淮流》并未止步于苦难的呈现,而是将其转化为唤醒青年的动员工具。它记录蒙城的惨剧,揭露日军“三光”政策的残暴,刊载战地见闻,描述“寇兵血河映淮水”的残酷景象,以具象化的暴力叙事激发愤怒。同时,通过“夜夜阴兵垂泪”的民间传说,赋予牺牲者悲壮的集体形象,使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成为抗争精神的延续。这种叙事策略既直面暴行的残酷,又将其升华为“保家卫国”的伦理召唤,当青年目睹家园破碎、同胞落难,个体的恐惧与悲愤被转化为对抗战的使命感。最终,敌人对同胞的暴行不再只是伤痛,而成为驱动青年走向战场的动力。

以“魂”铸魂,传播革命烈士的精神。1939年10月20日,在豫皖苏根据地中的亳县卞竹园,亳县常备第二中队指导员刘冠民“与敌作战,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为国殉职,烈士生前尚实干,为人忠厚正直,为了执行政工人员任务,光荣为国殉职,实开皖北政工人员殉国之先例”^{[20]30}。《淮流》作为豫皖苏根据地党委在皖北地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其将青年的向心力与模范个人的吸引力相结合,多次刊登烈士事迹。《挽刘冠民同志》和《你是我们的前哨:悼刘冠民同志》,以“你用血教育了大众,你用死唤醒了我们。我们的部队向着敌人进军,冠民总争的最先,我们要拿着枪口,对着敌人的胸脯,吮回失去的血。我们要去取祖国最有力的土,塑起你杀敌的浮雕”^{[21]45},以及“我们永远不会丢弃这惨痛的记忆,我们永远向前进,沿着你的血迹”^{[22]31}等激昂的文字,颂扬其为国捐躯的精神。1939年,张玉璞营长率300余名军队战士在葛店子与敌军遭遇,战士们“奉命与敌军搏斗十个小时,伤亡300只多不少,直到最后剩能战斗的张营长一人。受伤的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坚决反对,要与阵地共存亡。此时,敌人仅距我军数十公尺,他挺身而出,大声如雷呼道:‘鬼子,我换你们几十个!’向前掷去两手榴弹,并用手枪向敌射击。毙敌30余人,当时敌人二三百冲锋而前,张营长光荣的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23]15-16}。《淮流》登载的刘冠民、张玉璞等烈士事迹,不仅是对他们的讣告和悼念,更是一种系统化的“精神铸魂”工程,旨在采用这种革命烈士的英雄叙事感召青年,将个体的牺牲转化为集体抗战的精神动力,激励青年继承烈士遗志,投身抗战事业,以烈士之魂铸造青年自己的战斗之魂。

4. 信心锻造:我军之胜利与敌人之裂隙

以“乱”促变,透视法西斯集团的社会裂痕。国际新生力量的成长与帝国主义的疯狂同时并进,最终会成为法西斯统治的掘墓人^{[24]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全面性逐渐高发”^{[25]4}。1939年10月30日,轴心国集团内部“素以亲德著称之法西斯阁员,相率去辞。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讲演后,会场被炸毁,紧接着夜间柏林市中心区作广告的希氏照片,它和它的演讲所遭了同样的命运,法西斯政治的危机逐渐出现了”^{[26]4-5}。“希特勒的劲旅没有像侵占奥地利、瓜分捷克、进攻波兰时那样英勇。英法的健儿也同样蜷伏在水门汀策成的最新式的壕沟里?这并不是帝国主义们自己客气,而是他们在通盘筹算之后,认为倘照目前这样打下去,一定得不偿失,甚至于弄到‘画虎不成,顾此失彼’的境地。其他如捷克,奥地利等地也常常发生骚动”^{[27]4}。

法西斯日本国内和国外的情形更弄得乌烟瘴气,黑漆一团^{[28]5}。“40亿元,这是日本全国农村的负债总额。为还债劳动,为还债生活,是日本农民的真实姿态”^{[29]9-11}。这直接告诉了青年,日本国内情况并不理想,两年多的侵华战争,给日本农民带来了比债还可怕的负荷,负荷有三:“第一,人手不足的苦恼。敌军第十师团士兵吉川直行的家信里说:自你出征以来,仅一年中我村被召出征的人到了简直数不清的程度。一家壮丁全部出征的家庭继续增多,夏泊村川内家,兄弟六人全入军籍。第二,刮脂抽血的蒸发。日本每一位农民间接负担着国家预算和税负的重荷,又

担负了一种直接的资金蒸发。敌军第十师团吉水鹤藏的家信说:各种会议已决定本村财蓄83 000元,一户平均200元。因此,日本岛取县国防妇人会有一首报国财金小歌说:‘挤出血和油,共做后援金。’第三,物价腾涨,米价滞定。随手翻检的敌军士兵家信都写着这些物价高贵的事情,如今年物价之高令人吃惊,物价高涨达到20%左右。但是作为农民生活唯一支柱的米价却没能涨价,农民更加入不敷出,生活日渐恶化。迫于饥寒的反战反榨取的农民斗争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新形式出现。根据敌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自1938年4月到8月,农村所发生的骚动与冲突达1 900多次,到1939年2月17日,敌国下关东南部町与天坪因征兵发生激烈暴动,乡民到处放火,计被烧房屋300余户。这几个简单的数字足够说明,日本广大农民反战反榨的斗争是越来越尖锐化^{[29]9-11}。”同时,“日本人民在国内经济恶性逆流通或恶性膨胀之下,不但扩大积累仇恨政府,反对军阀的情绪,而且公开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农民到处抢粮掠米,工人组织到处袭击政府的秘密会社,白发苍苍的老头儿都以‘反政府嫌疑’,捉到官里去。美国反日团体又扩大了禁军火予日的运动。国际间任何一国轻描淡写的事件都够日本军阀眼花缭乱”^{[28]5}。《淮流》对法西斯集团内部危机与日本农村困境的书写,旨在揭穿日方宣传的“大东亚共荣”谎言,日军连本土农民都无法“拯救”,其所谓“解放亚洲”的口号自然沦为虚妄。众多数据化的苦难呈现更将反战情绪转化为可感知的阶级压迫,激发青年对敌国底层民众的共情,同时反向强化“侵略必败”的规律性判断。通过“敌国惨状”警示战争延续的毁灭性后果,从而将敌人“速胜论”所带来的焦虑转化为青年认可的“持久战”信心。

以“胜”励志,报道对敌作战的大获全胜。抗日战争期间,对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不仅体现在文字和口号的传播上,更通过现实战役的胜利鼓舞青年参加救亡运动。1940年,《淮流》刊登文章《曹村车站》,通过将七名抗日游击队士兵伪装成卖鸡蛋的农民,以智取方式歼灭日军的战斗过程进行记录式书写,向青年传播了我军对敌作战的大获全胜。七个农民装束接近车站时,哨兵对其进行严厉的盘问,“‘什么的做?你们的站开些!’一个麻子脸的中年人恭敬地鞠着躬说:‘太君,我们是卖鸡蛋的老百姓’。哨兵终于断定了这不是来袭击自己的毛猴子(中国军队的混称)”^{[30]31-38}。他们以卖鸡蛋的普通百姓身份应对,成功消除了哨兵的疑虑,也以“平民英雄”的角色设定打破传统战争叙事的精英化倾向,通过士兵伪装成平民百姓使青年更加坚定了自己能够为抗战出力的信心。随着日军士兵的聚集,中年麻脸人轻轻地说,“‘是时候了!’七个人突然扭过身体,轻快地从腰包里掏出驳壳枪,冷静而愤怒地掰开了保险栓,开始了射杀,子弹声的连响,震撼着大地,近处树枝上的雪片,刷刷地抛落着,枪声淹没了一切。日军呻吟着,血染印在雪地,皓白与鲜红的色彩相映,尸身铺盖了一地”^{[30]31-38}。从“恭敬鞠躬”的伪装到“冷静射杀”的爆发,再到“从容撤离”的收尾,这种“战术经验故事化”的传播策略,成功将军事行动转化为青年学习的范本,使青年在阅读中完成从旁观者到潜在行动者的身份想象。“伙伴们钢铁的突击,举起了枪杆,爬上了屋顶,鲜血的飞溅,痛苦的呻吟,生命的颤抖。无数人倒下了,无数的心变惨淡,崔华山被打掉了一口齿牙,汉奸们更狼狈地四散逃窜。可怜鬼子们三路进犯皖北的梦幻,到此一把大火烧作了漫天的野烟。”^{[31]43}芦家庙战役的媒介再现也是军事行动转化为宣传动员的传播实践,青年看到了“大火烧尽侵略幻梦”的胜利图景,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保卫亳州,保卫大皖北,要为保卫国土而战”^{[31]43}的呐喊,强化了“皖北”的地域符号,使皖北保卫战具象为“青年力量守护乡土秩序”的认知共识。这两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不仅造成了日军的重大伤亡,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更是抗日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抗战两年以来,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其兵员的伤亡尤为严重,更令敌国军阀胆裂和气馁。在相持阶段以前的敌军伤亡,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惊人的数字”^{[32]22-23}。由七七事变到同年年底战事发生时,敌人派这来的兵力,“仅四个师团(每师团按战时编制约一万五千至三万人),以后

陆续增加,至战事延及南京时,南北战场的敌军已有二十师团以上,在这一期间(约六个月),敌军死伤约在十万人以上^{[32]22-23}。“从南京退出至徐州放弃,敌方在华作战兵力由二十五师团增加到三十三师团,人数约七十五万余,敌军在这期间的伤亡,几近三十一万有零。从徐州放弃到武汉失守,敌人在华势力,没有增加。这一时期的抗战中,敌军的阵亡人数为九万六千余人,合计起来约在四十万。另据中央社本年十月十四日香港电:敌在此期间伤亡总计:陆军约三十二万四千人,海军六万八千余,共计三十八万余人。以上两个统计,可见敌军在第三期作战中的伤亡人数约四十万左右。从卢沟桥事变至放弃武汉的十五个月中,敌寇的兵员损失约达八十余万。敌军的伤病益甚严重,敌国151处医院,现已有人满之相,所容纳伤病兵为数约15万以上。日本全国红十字医院现已完全改为伤兵院,不复替外来患者诊治,由此便可窥悉敌军伤病之严重。”^{[32]22-23}《淮流》通过援引中央社电讯、外媒统计及日军后勤困境等多元信源,将抽象的战斗形势转化为直观的敌军伤亡人数图谱。这些具体的伤亡数字,瓦解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暗示日军侵略的代价已逐渐动摇其侵略承载力,“更惨烈的战争还要日渐展开,敌寇伤亡的数字还要相继增大,所以我们在这最艰苦的时期必须坚持团结,坚持抗战,集结我们全阵营的、新生的、进步的伟力,去击仆敌人,争取反攻局面的来临”^{[32]22-23}。这种“用敌人之殒证我族之韧”的书写策略,既有助于消解青年对日军武力的恐惧,也使青年建构起“时间在我”的信念,增强了青年抗战必胜的信心。

三、青年觉醒:从媒介宣传到抗战实践的深层联结

《淮流》通过特定的宣传报道,不仅成功地向青年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战时的社会动态,更在深层次上实现了宣传报道的多重价值转化。通过重构青年的认知框架,将个体的认知升华为对抗战的认同,使青年在“学习-实践-革命”的逻辑链条中找到个人与民族的连接点。在接触到越来越多青年抗日组织的消息、感悟到越来越多为革命牺牲勇士的精神以及看到侵略者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后,青年对抗战必胜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从思想层面的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助力。从媒介记忆的视角看,历史时期媒介的宣传动员可以将历史叙事转化为现实行动的指南,抗战时期《淮流》宣传动员青年投身抗战的历史经验成为当下青年助力中国梦的思想资源。这三个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的价值体系。

(一) 认知框架的重构:从个体认知到抗战认同的升华

《淮流》通过对学习议题的设置与话语实践,将青年个体日常的学习历程升华至对抗战学习的认同,成功重构了皖北青年对抗战学习的认知框架,即个人学习成长与民族救亡紧密相关。在技术层面,《淮流》强调“在工作中学习”的科学方法,要求青年通过实践掌握革命规律;在态度层面,倡导“自我批评”的反思精神,引导青年在思想改造中实现自我超越;在认知层面,注重让青年了解抗战至今的两方局势以及侵略者内部出现的问题,推动青年建立抗战必胜的认知。这种认知重构并非单向度的灌输,《淮流》读者信箱中有青年提问,“中国胜利后,对日本如何处置?”“对过去附属地安南朝鲜如何处置?”“各国法西斯现状如何?”“法西斯主义之战内与战后的特质如何?”^{[33]18-20},通过青年的主动参与和自我反思,实现对抗战认同的内化与升华。从抗战动员的视角看,这种认知框架的重构,是青年努力学习正确抗战的知识,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动力。

(二) 情感动员的实践:从思想觉醒到参与抗战的转化

《淮流》采用情感动员策略,将参与抗战从思想层面的觉醒转化为青年实际参与抗战的行动驱动力,实现了青年宣传动员从认知到实践的跨越。《淮流》以“困境-责任-行动”为叙事逻辑,通过呈现学生运动的现实挑战与历史经验,青年抗日组织的责任与革命烈士的英勇牺牲,激发青年

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这种情感动员并非简单的情绪煽动,而是通过“以亲共情,以难唤情”的叙事策略,将抗战困境转化为青年情感共鸣的节点。而情感共鸣为抗战动员提供了持续的情感动力,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凝聚力与战斗力。“青年学生组织童子军,广大青壮年积极投军抗日。百万人口的阜阳县,投军抗日的青壮年达 53 752 人,战死疆场有名可查者 1 100 余人”^[34]¹¹。同时,通过对青年日常情感问题的重新诠释,向青年提出要做一个“革命的恋爱者”,以此激发青年参与革命的行动力。这样的叙事策略,将青年的生活化问题、抗战困境、革命精神与组织归属感转化为情感动员的工具,激发了青年的使命感与归属感,为战时青年从思想认同走向实践参与提供了强劲而持续的内在驱动力。

(三)历史记忆的再生产:《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经验的当代转化

《淮流》中留存的革命记忆,在当下成为突破时空限制的媒介记忆,从而实现了抗战时期青年宣传动员经验的历史性赓续。《淮流》宣传动员青年的经验表明,一方面,《淮流》作为中共皖北特委的机关刊物,其党刊属性注定了其对青年具备天然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淮流》通过教育青年正确学习、塑造革命思想、锻造抗战必胜的信心以及动员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宣传动员呈现多维度的特征,以动员的广泛性契合不同青年的个性。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作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在抵御敌军、推动抗战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册[M]. 合肥:滁州报社印刷厂,1985:237.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7年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189-191.
- [3]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下[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269.
- [4] 中共阜阳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阜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淮颍怒潮[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 [5] 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469-472.
- [6] 白若. 关于淮涛报告[J]. 文化月刊,1939(2):45-47.
- [7] 王乔鹤. 发刊词:淮涛是由抗战教育旬刊脱化而来的[J]. 淮涛,1939(1):1.
- [8] 大田. 加紧唤起民众[J]. 淮流,1940(7):12-13.
- [9] 屈柏辛. 关于青年的学习问题[J]. 淮流,1939(5/6):23-24.
- [10] 克之. 青年问题漫谈之一:在工作中学习[J]. 淮流,1939(4):17-18.
- [11] 光之. 武装我们的头脑:青年问题漫谈之二[J]. 淮流,1939(4):19-21.
- [12] 李翔. 谈战时青年教育[J]. 淮流,1939(5/6):20-22.
- [13] 笑生. 战时青年恋爱问题[J]. 淮流,1939(5/6):25-26.
- [14] 野军. 我们怎样开展皖东的青抗组织[J]. 淮流,1940(7):26-27.
- [15] 李翔. 谈今后的学生运动[J]. 淮流,1940(7):24-25.
- [16] 臧克家. 过蒙城:“淮上吟”之一段[J]. 淮流,1939(2):9-11.
- [17] 臧克家. 过涡阳[J]. 淮流,1939(4):20-21.
- [18] 臧克家. 过阜阳:“淮上吟”之一段[J]. 淮流,1939(5/6):33-34.
- [19] 黄克. 八月集:血影[J]. 淮流,1939(2):31-32.
- [20] 尹莘野. 刘烈士冠名小传[J]. 淮流,1939(4):30.
- [21] 庄坤. 挽刘冠民同志[J]. 淮流,1940(13):45.
- [22] 侠心. 你是我的前哨:悼刘冠民同志[J]. 淮流,1939(4):31.
- [23] 百川. 某军东进途中伟大的张玉璞营长为国牺牲了[J]. 淮涛,1939(2):15-16.

- [24] 亚生. 国际现象十零:大英帝国始终调理不好的致命伤[J]. 淮流,1940(13):5.
- [25] 亚生. 国际现象十零:欧战和平呼唤之新阶段[J]. 淮流,1939(4):4.
- [26] 亚生. 国际现象十零: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重新估价[J]. 淮流,1939(4):4-5.
- [27] 亚生. 国际现象十零:目前欧战的发展形势,是战祸的泛滥[J]. 淮流,1940(7):4.
- [28] 亚生. 国际现象十零:日本军阀丢不尽的历史[J]. 淮流,1940(13):5.
- [29] 张香山. 战时日本农村危机的侧影[J]. 淮流,1939(2):9-11.
- [30] 林文行. 曹村车站(故事三则)[J]. 淮流,1940(13):37-38.
- [31] 楚明. 芦家庙(长诗的一段)[J]. 淮流,1940(13):43.
- [32] 夏雷. 两年来敌人血的收获[J]. 淮流,1939(4):22-23.
- [33] 薛节,林波,李显扬. 信箱:问题解答:(六)中国胜利后对日本及朝鲜等的处置[J]. 淮流,1939(2):18-20.
- [34] 政协阜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阜阳史话:第5辑[M]. 阜阳:政协阜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5:11.

On The Journal *Huai Liu*'s Function of Mobilizing the Youth

HU Chenglong, CHEN Yux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in 1937, the Anti-Japanese Base in Henan,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has become the hub connecting the two strategic regions in North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It urgently needs to combine forces to resist the Japanese enemy. But the youth in the Base faced multiple difficulties, such as education interruption, ideological confusion, and lack of guidance in the midst of war. Therefore, the CPC Party Committee of the Base founded the journal *Huai Liu* to educate and mobilize the young people. A review on this magazine reveals the four pathways of education and mobilization: reconstructing their knowledge about the war of resistance, cultivating their revolutionary ideas, stirring up their passion for fighting the war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onfidence in winning the war.

Key words: *Huai Liu*; Anti-Japanese Base in Henan,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Northern Anhui region;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 youth

〔责任编辑:朱 根〕